



【文化杂谈】

游东林书院

□陈伟

中学语文课上学邓拓《事事关心》一文,知有无锡东林书院及东林党。那书院门口著名的对联,谁人不知?风声雨声读书声,声声入耳。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。邓拓的文章大意是说读书人要关心政治。此一传统古已有之,起码从东林党人那里即有明证。大学八部,格物致知,诚意正心,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家事国事天下事,本在儒者为学必修的项目之内。大的学问,必定包括国事、天下事。而事事关心的心字,在当时理学与心学辩难交锋的学术背景下,更有特别的意涵。事事关心,或许并非今日所说的“在意”“上心”的意思。它是否可以理解为事事关心学中的那个“心”呢?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另文专门探讨一下。

前年暑假的时候,我有机会在无锡逗留了几日。白天闲来无事,便想着去无锡的景点逛逛。锡惠公园、蠡园、鼋头渚这几处景点,在小学四年级春游时已去过。梅园也曾游览过。不如去一个新的地方吧!东林书院这样一个有名的地方,何不去看看呢?于是立刻动身,不想当时是下午五点多,到达时发现,景区已经关门。只得得书院的河边,站在河的岸边望去,看对岸密密匝匝的树林在暮色中逐渐模糊。

第二天,再次专程来到这里。夏日炎炎,酷暑的天气,若非内心对某种景致的向往,绝无出来的兴致。书院的特点是“水边林下”。茂密的树林,东边的河流,加上些明代风格的建筑、楹梁、牌坊,构成了这一久负盛名的文化景点。游览的人甚少,毕竟,若非有文人的雅兴,有几个游客会来此观光呢?这里面除了房子,桌子,园林小景,什么也没有,“不好玩”“没有意思”。现如今,它已成了无锡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传统文化教育基地。大概中学生会被组织来此接受教育,而非“游玩”。人们对单纯的历史文化遗迹,总不及对迪士尼乐园、欢乐谷一类的地方有兴趣。然而,它毕竟是有历史文化底蕴在的。如深谷中的幽兰,不能大红大紫,却一直散发着它的馨香。君子爱兰,君子如兰。对于历史文化景点,若非有关情怀,有对历史知识的兴趣,只会觉得索然无味。

入得书院,讲学的地方、住宿的地方,一一可以看到。这些建筑,虽为重建,但仍不难让人想象当时文人讲学的场景。东林书院由告辞在家的顾宪成、顾允成兄弟偕众友创建。顾宪成去世后,书院由他们的同道高攀龙主持。几人都曾为万历朝的大官,几乎又都因上书言事,批评弊政而被贬官,乃至削职为民。其时,明朝的宦官专权已十分严重。朝政荒废,世风日下。不出多少年,大明王朝就亡掉了。这些批评朝政者,被诬为东林党。其实他们人数极为有限。杯弓蛇影,朝廷害怕文人议政,一时竟将所有作风正派、敢于批评谏言者称为“东林党”。

在历史上,东林书院即曾被毁过。据说拆下的木料石块,拿去建魏忠贤的生祠去了。木石无言,可以筑忠良清议讲学之高大上的地方,也

可拿去建乱臣贼子奸邪之人的所在。高攀龙得知将要被捕时,效屈原之事,投池水自尽,留下遗书一封,其中仍不忘向皇上表忠心,称自尽不是畏惧,是为了避免受辱,臣辱则国辱云云。

思想史上写到东林思想时,大体言东林思想对明末实学发展之贡献。顾宪成“居水边林下”而“志在世道”,反对迂阔,反对遁入空门的王学,讲“日用常行,须臾不可离之事”“愚夫愚妇之所共知共能”的内容。每逢讲会,除地方士绅到会,平民百姓亦前来听讲。“顾宪成是明末理学转向实学的著名思想家之一。”(《明清实学简史》,第315页)而高攀龙为“一时儒者之宗”,同样反对谈玄说玄,力排佛、老,视佛、老为国之蠹虫,提倡有用之学。王阳明的无善无恶说遭到了东林党人的批驳。东林士子对“三教统一”说也予以批判。他们认为,三教统一的本质是以佛代儒。一统三教,实际上背离了儒学之根本。高攀龙还有惠商恤民的思想。他反对苛捐杂税,反对对商人的盘剥,认为应当为工商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。东林思想家为新兴市民阶层发言,实为“早期启蒙思想家”的先驱。(步近智文、陈鼓应等主编《明清实学简史》,第330页)

黄宗羲对东林士人颇为同情。他在《明儒学案》中指明,称东林士人为东林党人,本身即为冤枉。

东林士人之学,仍为儒学正宗。它们还在孔孟之道的圈子中打转。不过,它们仍发挥了其批评时政的作用。东林士人并非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。他们绝不是公知。他们的衣食不能自足,更不是靠写文章换取稿费。他们不过是尽了一个儒者的本分,为国尽忠,在家尽孝。他们在儒家道德理想的指导下,对时弊作出反思。而专制政体亦容不得此种来自庶民的批评。上书谏言,被贬官。或再度起用,或永远告别政治舞台。此种宦海沉浮,仅是个人之事,于顽固的体制毫无作用。用今天的话来说,东林士人皆为体制内人士。他们的清议,并不挑战君权,亦不受朝廷法律的保护。尽管如此,在当时大多数世人奉行明哲保身的情况下,他们敢于明是非、辨善恶,不甘于沉沦,发出自己的声音,并以讲学的方式影响社会,培养人才,亦实属可贵。儒学之精神,不正在于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理想主义吗?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分,自此亦不难看到。无疑,东林士人如顾氏兄弟、高攀龙、钱一本等都是些堂堂正正的君子。他们重义不重利,在污浊中保持一股清流,不计较个人在官场上的得失。高攀龙从地方判官职上退下时,有一千余金俸禄未领,巡抚发文要他去取,他竟辞而不受。当然,顾、高家中无此俸禄依然能够维持生计。顾氏兄弟发表批评意见、与阉党斗争时,难道不知道后果?他们是真正的有浩然正气的士人。

出来时,沿小径折向东开的一个门,经过一个茶馆。茶馆前面有假山小池、各色花草树木,甚为别致。出来到大马路上,那书院的景象,便在白色围墙后隐去了。这是个好地方,也算是无锡的一张文化名片吧。我心里想着,不觉已走到了路口。

□王兆贵

据史书记载,南唐时期的冯延巳,擅长写诗填词,虽然贵为宰执,却从未荒废。他的那首《谒金门》词,起笔写道“风乍起,吹皱一池春水”,语感煞是流畅,摹状尤为生动,一时间不胫而走,四处传扬开来。

在我国古代,纯粹的专业文人很少,多的是亦官亦民亦学者,冯延巳当然也不例外。那时的官员,于正业之余,都有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之类的雅兴。但在艺术造诣上,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名垂史册的。文笔好不好,仅在文人圈中称道是不够的,还须得坊间流行。就拿柳永来说,他在词坛上名气之所以那么大,以至于“凡有井水处,即能歌柳词”,无疑是坊间争相传唱的结果。实际上,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,能够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作品,不见得一定是鸿篇巨制。多数情况下,一篇短文或是一首小诗、小令,甚至是看似寻常实隽永的句子,就能名动朝野。这种现象,在北宋尤为突出。例如,秦观因在词中写有“山抹微云”等句子而被称作“山抹微云学士”,张先因在词中写有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而被称作“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”,宋祁因在词中写有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而被称为“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”,贺铸因在词中写有“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黄时雨”而被称为“贺梅子”“贺三愁”。直到今天,也有不少文化名流之所以能被人记住,也是得益于他们作品中那些闪烁着人文之光的名言警句。这种现象,与知识碎片化无关。同今天的网红流行语相比,差别在于生命力。无论是谁的作品,名动一时易,千古流芳难。只有那些经过岁月淘洗后仍然光泽不减的金句,才能荣列经典之殿堂。

冯延巳官做得不怎么样,于功名和人品上也乏善可陈,但却多才多艺。南唐立国之初,烈祖李昇任命他为秘书郎,让他与太子李璟交游,看重的主要是他的才情。后来人的评述表明,冯延巳在词坛上的地位颇高,被陈廷焯誉为“五代之冠”,王国维称他“开北宋一代风气,中、后二主皆未逮其精诣”。冯延巳的词,介于婉约与豪放之间,“独立小桥风满袖,平林新月人归后”“将远恨,上高楼。寒江天外流”“寒山碧,江上何人吹玉笛?扁舟远送潇湘客。芦花千里霜月白,伤行色,来朝便是关山隔”等句子,很难说超脱了花间词的窠臼。不过,他的那句“风乍起,吹皱一池春水”,看似明白如话,却把风生水起的韵味攒足了。

一次,内廷赐宴,元宗李璟很随意地对冯延巳说:“吹皱一池春水,干卿底事?”冯延巳答:“安得如陛下‘小楼吹彻玉笙寒’之句?”这番

【若有所思】

干卿底事

对话,不过是席间调侃。将冯延巳的回话上升为媚上邀宠,似乎有点解读过度了,尽管冯延巳这人的口碑不怎么好。再说,他俩的交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,于艺术天分上知根知底,不经意间谈诗论词,既有互相切磋的默契,也有各谐其趣的自得。应该说,李璟的“小楼吹彻玉笙寒”是难得的佳句,而冯延巳的“吹皱一池春水”则妙道自然,浑然天成。一个土俗的“皱”字,比起“微澜”“涟漪”之类的雅言生动多了。

“干卿底事”一语,说白了就是关你什么事,后来遂成典故,用来讥诮他人管闲事。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说,诗人爱管闲事,所关注的事情越是不要紧就越好,所谓“吹皱一池春水,干卿底事”也。袁枚举例说,陈德荣的《七夕》“笑问牛郎与织女,是谁先过鹊桥来”,杨维桢的《柳花》“飞入画楼花几点,不知杨柳在谁家”,都属于这种情况。袁枚的话说得轻巧,却触着了文学艺术的神经末梢。在文学艺术领域,家国情怀很重要,但也须从细微处着眼。文人们所吟咏的山水草木、人间世故等,无非闲情逸致,虽然当不得饭吃,但也不可或缺。

风摆杨柳,雨打芭蕉,烟笼寒水,雪压竹枝,月摇桂影之类的自然现象,自是寻常闲事。但在文人眼中,却能触景生情,诱发灵感,激起创作冲动,以至浮想联翩,欲罢不能,于是便伏诸案前,形诸笔端,于是便有了诗情画意。倘若较起真来,质问林逋: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干卿底事?”质问苏东坡:“春江水暖鸭先知,干卿底事?”质问李清照:“应是绿肥红瘦,干卿底事?”质问张先:“云破月来花弄影,干卿底事?”如此等等,岂不大煞风景?从文学艺术功能上说,闲事并不闲,无用乃大用。小说散文也好,影视剧作也好,诗词歌赋也好,琴棋书画也好,都是不能当饭吃的。但若没了这等闲事,这等闲情,就没了所谓的诗意栖居,没了所谓的诗和远方,岂不“闷杀人也么哥”?正因为如此,我们应当感谢那些爱管闲事的文学艺术家们,感谢他们为我们奉献的精神食粮。

进一步说,为文是这样,为人也是这样。对于世间的闲事,总要是有人关心,有人过问,有人出头管上一管,倘若大家都抱着“关我何事”的心态高高挂起,世风如何能够改变?世界如何能够进步?

